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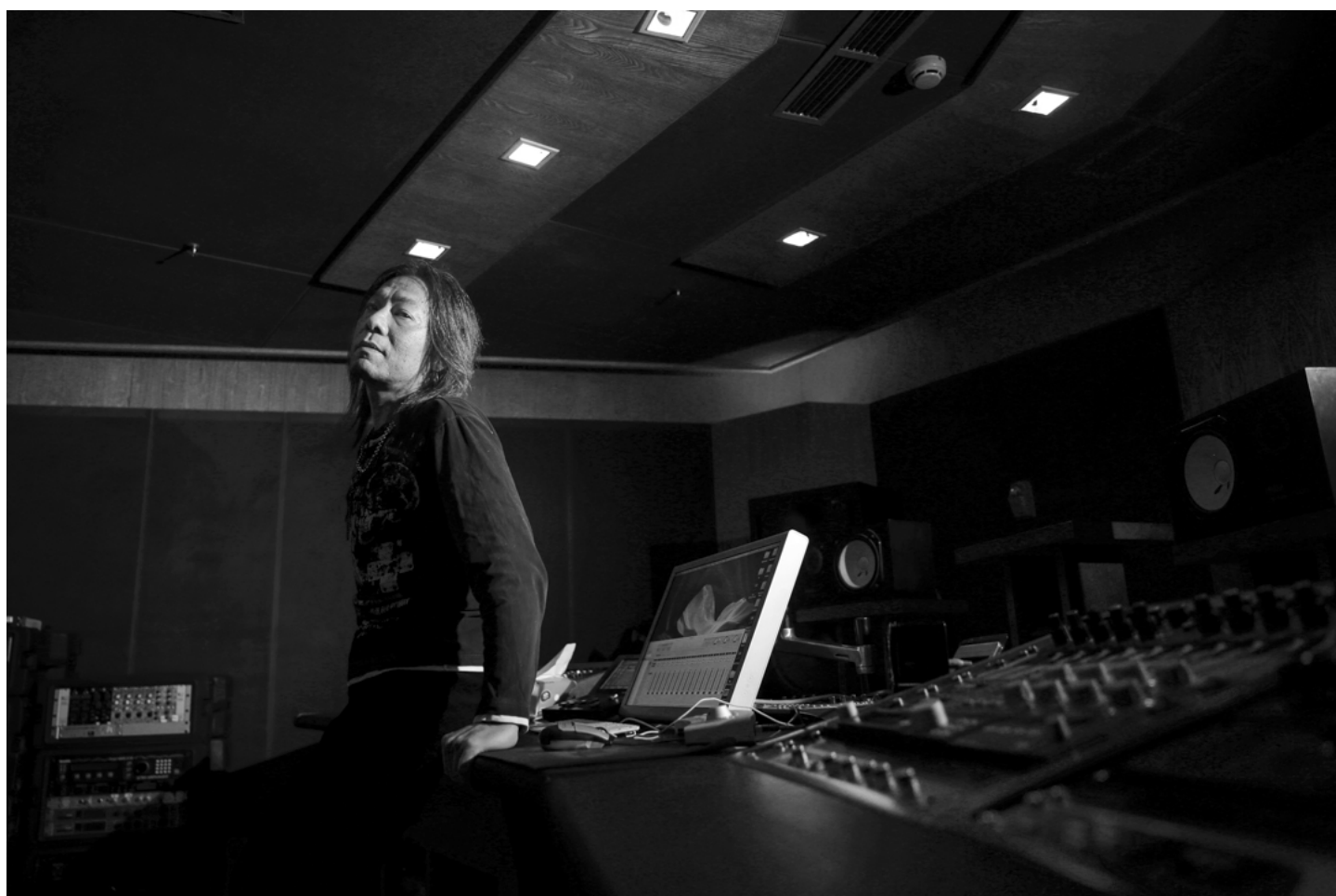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颜仲坤——望着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远去，他用“佛系”回应喧嚣

窦唯、张楚、何勇、唐朝.....这位台湾音乐人在中国摇滚乐最具戏剧性的时间点，记录下音符的火热。接下来，他悠然自得地生活在娱乐至死的北京。

特约撰稿人 鞠起 发自北京 | 2018-02-23



颜仲坤顶着一头灰白蓬乱的长发，一身阿迪达斯的运动装扮，口音和用词被北京影响着，变成一种南北混杂的有趣语言。过去一年，他的工作一件接着一件，朴树的《猎户星座》和王菲的《无问西东》等新歌都出自他手。摄：尹夕远/端传媒

颜仲坤坐在北京城东繁华街市中的一座录音棚里，顶着一头灰白蓬乱的长发，穿着一身运动装扮，像是全部从同一家店买的。他操着柔软的台湾国语，音调和用词却被北京话影响着，变成一种混杂有趣的语言。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他的工作一件接着一件，王菲的《无问西东》、朴树的《猎户星座》等新歌都出自他手。但他似乎对于自己的“行业地位”毫不自知，也并不在乎。

这位来自台湾高雄的混音师和大陆乐坛有着不解之缘。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台湾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在大陆发行第一张摇滚乐合集《中国火》，让“八九”后的中国大众第一次听到张楚、窦唯、唐朝乐队等本土摇滚乐手的嘶吼和独白，俨如一剂时代的强心针。当年才二十岁出头的颜仲坤，在台湾为素未谋面的大陆同行完成了这张唱片的混音工作。两年之后年，他和唱片里的歌手一同前往香港演出，红磡体育馆的观众前所未有地起立欢呼鼓掌，他站在舞台的总控制台上，看到了大陆摇滚乐光芒万丈的那一刻。

从那为起点，颜仲坤在两岸往来不停，行行走走。二十多年来，他讶异地看着GDP一路狂奔的大陆，也经历了摇滚乐在这片土地上从巅峰滑落至寂寞的整个过程。节奏和旋律愈发喧嚣，而当年那些闪亮的名字，现在却几乎无人知晓。最终，颜仲坤决定回应这片喧嚣，定居在娱乐至死的北京城里，做一位对音乐赤诚的异乡人。

因为精通英语而偶遇“中国火”

颜仲坤在大学念的是法语系。他很有语言天分，法语、英语都说的相当流利。外语成了一块敲门砖，让他在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当时技术门槛很高的台湾录音行业。90年左右的台湾音乐行业百家争鸣，滚石、飞碟、点将等本土唱片公司都在蓬勃发展，颜仲坤所在的录音棚几乎每周的档期都是满的，来来往往的客户里，不乏齐豫、周华健和小虎队这些大明星。

“如果你要从一个录音助理干起，要很久才能去操作那些大型的混音台，起码好几年。”颜仲坤说，“但是呢，我当时在打工的录音棚，正好买了一台新的设备。说明书是全英文的。整个棚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看得懂。”

语言优势让颜仲坤率先掌握了新设备的用法，成为录音棚里最被倚重的人。他突然发现，如果自己能够把所有设备的说明书都读一遍，恐怕连棚里最老资格的师傅都要和他学习。功不唐捐，90年代初，年轻的颜仲坤已经是圈子里颇有名气的新锐录音混音师。

1991年，滚石唱片的副经理张培仁成立了魔岩文化（后来称魔岩唱片），英文名为Magic Stone。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滚石系的唱片公司都以“石”为名，而张培仁又不想做“名门正派”，索性叫做魔岩。在当时，台湾的摇滚乐和商业的结合，已经捧出了罗大佑、李寿全、薛岳和红蚂蚁等一批颇受欢迎的摇滚音乐人。张培仁渴望将台湾的摇滚乐运营模式带到大陆，开发大陆摇滚乐的矿藏。

魔岩的第一张专辑是收集了张楚、黑豹、唐朝等中国摇滚乐手作品的《中国火》。当时的制作人贾敏恕带着刚刚录好的母带，找到了身在台湾的颜仲坤。后来，人们听到的歌曲《姐姐》里飘在头顶的悠扬笛声、立体的鼓声，以及张楚有些距离感却又格外清晰的嘶吼，都出自颜仲坤之手。



二十多年来，颜仲坤在北京走走停停，经历了中国摇滚从巅峰快速滑落至寂寞的整个过程。期间曾为歌手顺子录制脍炙人口的歌曲《回家》，也帮崔健执导的电影《蓝色骨头》做原声带混音。后来不想再频繁往返两岸，决定在北京定居、生活。摄：尹夕远/端传媒

《中国火1》大获成功之后，魔岩相继签下“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和张楚）。工作接踵而来，《垃圾场》、《黑梦》、《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作为混音师，颜仲坤需要调整好每一个乐器的音色、方位和音量配比，以确保每一种声音都清晰悦耳，却又互相融合。这对器乐语言尤为丰富的摇滚乐来说至关重要，而颜仲坤也凭着天分和耐心，为作品把好最后一道关。1994年春天，为了参与“魔岩三杰”第一张个人唱片的首唱会，颜仲坤迎来了他的首次北京之旅。

颜仲坤看到了一座在经济发展中一路狂奔的城市。高楼、地铁、华丽的百货公司和紧俏的出租车，以及剧场外穿着新潮的年轻人们。在当时的北京儿童剧院，一直和“魔岩三杰”的噪音打交道的颜仲坤终于见到了他们本人。在这场演出里，颜仲坤熟悉了中国摇滚乐的设备配置、乐手的习惯和现场的风格。这次的北京之行，为几个月后的另一场重要演出做好了准备。

1994年12月的香港红磡体育馆，魔岩三杰和唐朝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就了中国摇滚乐在20世纪末最闪亮的时刻。当时，颜仲坤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怎样的事件当中。他带队到达香港之后，先是带着窦唯的团队在当地的排练室进行排练，演出时和音响师金少刚一起在总控制台负责现场音响的调度调试。

“当时我负责的是吉他和演唱的声音，整场都很忙，音量啦，音色啦，我都要去弄。就这么忙了几个小时候……”颜仲坤回忆，直到后来他给演唱会专辑做混音时，“才有机会好好听到这场演出。”

1994年的红馆，黄耀明、王菲都是观众，还有乐迷声称遇到黄秋生在台下挥舞着双臂、神情激昂。张培仁曾这样回忆，“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磡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中国火》和红磡演唱会向中港台三地普及了大陆摇滚音乐，它成功地把“中国摇滚”的概念从“崔健”中剥离了出来，作为一种音乐体裁而成立。这一晚之后，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

除了崔健式的布鲁斯和民谣摇滚，还有朋克、金属和迷幻摇滚乐。客观地说，如果说崔健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那么正是魔岩的发掘和打造让整座冰山浮出了水面。

在演唱会后来的专辑制作中，颜仲坤用他的混音技术将这一晚的红馆还原得丝毫不差。多年后，人们再次去听那场演出的录音，依然能感受到每一个音符、场馆的空间感和空气中的狂热。

魔岩热潮褪下，留下了北京情谊

1995年，颜仲坤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已经是窦唯第二张专辑《艳阳天》的主要制作人。

他在台湾听过窦唯所有的demo，然后提出修改意见，和窦唯一起商量，“把demo弄到一个可以进棚的状态，”然后在5月飞到北京和窦唯一起录音。

当年7月完成《艳阳天》的混音之后，颜仲坤只休息了两三天，就开始了超载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他们一起进行了10天排练，他给乐队提了很多建议。“我的意见被采纳的概率还蛮高的，10个建议里面有9个大家试完都觉得‘诶不错’就留下来了。”他笑着说。

大陆的乐手们在长期的自行探索中形成一套自己的术语系统，和台湾完全不同。这时候，竟然又是英文充当了沟通的桥梁。“毕竟很多音乐上的词汇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结果一群说中文的人，排练的时候竟然用英文来交流。”

做完超载的专辑已经是9月。颜仲坤在北京的录音棚里过完了1995年的整个夏天。正当他欣喜于自己已经渐渐作为制作人掌控整张唱片，却没想到，做完《超载》之后，魔岩唱片在1996年悄悄地退出了中国内地。

“收掉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还是真的亏太多钱了。”颜仲坤感慨。魔岩在内地六年，看似风光无限，他们发掘的魔岩三杰、唐朝、黑豹、王勇和超载，几乎就是整个90年代的中国摇滚代表，可惜他们始终没能找到能在这片土地上盈利的方法。

“你在市面上看到10盘《唐朝》卡带，9盘都是盗版。”混乱的市场让正版唱片毫无竞争力。想打官司，既抓不到人，也无法可依。办演出也是个死胡同——摇滚乐手总爱“惹事”，何勇就曾站在舞台上调侃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李素丽，被视作与中央宣传唱反调。而由于80年代末期摇滚乐演出制造了很多混乱场面，著名的一例是黑豹乐队的歌迷点燃了体育馆的窗帘，全国各个体育馆一听到“摇滚”两个字就如临大敌，避之不及。Live house在那时还没有出现。去香港演出，与其说是创举，倒不如说是无奈。即使红磡的演出叫好又叫座，又怎奈这场演出队伍庞大、山高路远——还是亏本。

虽然魔岩从大陆铩羽而归，如同马洛里葬身山谷。但这次不如意的旅程终究还是挖到了诸多闪亮的作品。“一开始到北京，其实就当是普通的出差，但是后来我看到北京的乐队在各种硬体条件跟西方差很远的情况下，大家都很刻苦。最后做出了这样一批好作品，这真的很不容易。”魔岩的工作，让颜仲坤在陌生的土地上交到朋友。直到现在，他还和当年的朋友保持联系。

“音乐人也是普通人，大家的性格都不一样。”颜仲坤回忆，“高旗（超载乐队主唱）和李延亮（超载乐队吉他手）本来就比较外向，之后录第二张专辑《魔幻蓝天》的时候也有邀请我来玩。窦唯话就少一些，但感情都是一样的。”

2015年的时候，颜仲坤再度和高旗一起工作，他突然说，“哇高旗，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年了耶！”

二十年前的魔岩热潮早已褪去。但退潮之后，依然有很多热诚对待音乐的人留了下来。他们从未止步，这其中当然包括颜仲坤。





颜仲坤就这样在北京住了13年，偶尔回到高雄和台北陪陪亲人。这些年间为内地的音乐添了不少新作品。除了老搭档窦唯和超载的新专辑，还有羽泉的《朋友难当》、李健的《风吹麦浪》和朴树的《平凡之路》等一系列听众们耳熟能详的好歌。摄：尹夕远/端传媒

来到北京，或许会做出更好的作品

1996年之后，除了一次短暂的观光，颜仲坤再没来过北京。他在台北继续音乐事业。除了台湾本土的乐队比如董事长、拾叁乐队和乱弹阿翔，他的工作覆盖到各种风格，从流行摇滚的动力火车、迪克牛仔再到纯流行的顺子和许茹芸，还有罗志祥和5566这样的偶像歌手。

“实际上盗版的问题不只是在大陆，到哪里都是很大的问题。”颜仲坤谈起实体唱片逐渐衰落的那几年。“除了盗版CD，网路下载的冲击也很大，本土的（唱片）公司一间一间都收掉了，活下来的也都把规模减到很小。”唱片卖不动之后，那些长得好看的，能带动现场演出收入的偶像歌手就变成了各个公司优先的选择。曾经门庭若市的录音棚也变得冷清了许多。

“我其实本来就是在在一个商业录音棚里面工作，那不论是谁花钱，都可以来录音啊。只不过早期贾敏恕给我的case都是摇滚乐，大家觉得我是做摇滚的。”颜仲坤谈到自己身上的“标签”。“但其实摇滚、R&B、偶像歌手什么的，都是流行音乐。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都要做，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

包括自己的工种。“很多人看到我的介绍，就说‘哦，他是个混音师’，其实不是这样啦。我也常常做制作的工作，也弹贝斯。做音乐嘛，叫‘音乐人’就好了，各个位置都要做，没什么区分。”

工作这样继续着，谁也没有预料，到了2005年，他几乎是一时冲动就带着太太再次跑来北京，而且来了就没有再走。

奇妙的事情在2005年初夏发生。台湾老牌歌手高明骏邀请颜仲坤来北京制作他在内地的第一张专辑《现在回家》。刚下飞机，颜仲坤放下行李，和高明骏在北京街边一家店吃涮羊肉。吃到一半，窗外有人张牙舞爪地朝他们招手。颜仲坤定睛一看，居然是音乐人张亚东。

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张亚东随口提起自己在建一个录音棚，他说，“Paul（颜仲坤的英文名），要不你就别走了，你就在北京吧，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棚。”

这样一个疯狂的提议，颜仲坤居然认真地考虑了。重游北京，让他觉得这里的音乐环境已和九十年代大不一样，整个音乐圈在很旺盛地生长，滚石在内地的余热还在，新的资本比如华谊也开始进入音乐圈，第一批电视选秀歌手带动了全中国对好音乐的渴望，摩登天空和迷笛音乐节也热热闹闹地办了好几年。虽然一切都还处在丛林状态，但突然之间很多事情都在同时发生。颜仲坤觉得很有趣——来到北京，或许会做出更好的作品。

三个月后，他在北京东五环外租了一套房子，他在那个空荡荡的房子里等了三个月，等待自己的书、唱片、设备、Marshall分体音箱和其他物件，从基隆港运到天津港，再抵达北京。然后一直住到现在。

在颜仲坤的帮助下，张亚东完成了中国最棒也最有趣的录音棚之一“喷气机录音室（Jet Studio）”。颜仲坤无不得意地说，“在布线的时候，我坚持要让他每一个房间都装上话筒和乐器的接入口，包括客厅甚至厕所里都有，都是可以用的！”这样一来，这个录音室就能够提供很多种类的房间声场，让制作人可以充分尝试自己想要的声音。此后很多年，这个录音室成为了颜仲坤和张亚东的重要工作空间。莫文蔚、张靓颖、水木年华、张悬，都曾在这里录制自己的作品。



颜仲坤在采访时，嘴边常挂着“没什么区别”、“很幸运”、“也很好啊”，加上他对佛学的兴趣，记者调侃他是一位“佛系”音乐人。他喜欢抽烟，但不挑档次；他喜欢喝咖啡，但不挑豆子。颜仲坤在中国摇滚乐历史最精彩的节点埋头调音，也在最焦虑的城市悠然自得。摄：尹夕远/端传媒

在最焦虑的城市里悠然自得

颜仲坤就这样在北京住了13年，偶尔回到高雄和台北陪陪亲人。他为大陆乐坛添了不少新作品。除了老搭档窦唯和超载的新专辑，还有羽泉的《朋友难当》、李健的《风吹麦浪》和朴树的《平凡之路》等传播颇广的好歌。2017年时，因为将近三年没回台湾，他甚至还接到户政事务所通知说再不回来，他们的户籍就要被迁到桃园机场去。

颜仲坤和夫人至今没有孩子，倒不是因为工作繁忙，而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考虑。

“我学法语的嘛，年轻的时候受到存在主义影响蛮深的——萨特和加缪什么的。他们就说啊，每个人的降生都不是自己愿意的，然后就这样被带到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受苦。佛家也是这么讲，‘众生皆苦’。人总是活在我执没能实现的烦恼里。”

对于颜仲坤来说，他虽然觉得这个世界还好，但也不是很愿意再不顾一个生命的意愿，让他/她来到人世面对这些麻烦了。所以，从十几岁时，他就和爸妈说：“如果你们想抱孙子，那去找我弟弟。”弟弟后来生了一个儿子，颜仲坤再也没有什么压力。

闲时，他喜欢研究佛教。曾有一次，他去一个歌手那参谋对方的编曲，晚饭时他就开始聊佛教，聊了两个多小时停不下来。他觉得佛家教人们放下“我执（Ego）”的理念很棒，无论外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人要是放下对“自我”的执念，在哪里都可以活得坦然。

所以他不是很赞成这一年来在大陆爆红的“中国式嘻哈”，那里面全都是“我我我我我我。”他觉得，流行音乐里很基本的切分、三连音、和押韵的技术被吹成多厉害的能力。好多歌词都在说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拿着这些上台互相丢。这样的氛围里面能诞生好内容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而且又在煽动我执的膨胀，这样一个电视娱乐工业吹出来的泡泡，没有什么好处。很多Hip-Hop的创作者，他们其实很有才华，笔下生花。只是他们的笔本该用来写诗，却急着拿它去换名利，站到台上去互相攻击，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或许是放下了“我执”所带来的好运，也可能是早期作品的名声加持，在北京的13年里，颜仲坤从来没有遇到过工作断档或是经济困难的窘境。对比台湾唱片工业体系的成熟，内地

的音乐产业其实直到现在都还在一个相对“丛林”的状态，拖欠尾款或者刷人情卡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应当感恩，太幸运了。”他说了好几次。

现在颜仲坤依然住在13年前的那间公寓，房租只是涨了一次，涨幅不大。他不打算买房，不想要为了房贷去工作，让资产占有他的生活。他没给生活划什么界限，一年到头穿着同一双阿迪板鞋，衣服也是夫人买什么就穿什么。2009年，歌手组合羽泉送了他一部iPhone 3GS，从此他迷上了手机摄影。当老朋友张亚东还在买单反镜头的时候，他已经在琢磨手机上的手动摄影APP。当工作不忙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带着手机出去扫街，一走就是8个小时。前两年，他的一些摄影作品还入选了欧洲的手机摄影展。

2017年开始，颜仲坤变得更加繁忙了。他参加了一些音乐比赛的评审，发掘了一些新的音乐人，并且开始在一个老牌的唱片公司担任他们某个厂牌的主理人。

在采访时，颜仲坤的嘴边挂着“没什么区别”、“很幸运”、“也很好啊”。加上他对佛学的兴趣，他被记者调侃是一位“佛系”音乐人。他喜欢抽烟，但不挑档次；他喜欢喝咖啡，但不挑豆子。他在中国摇滚乐历史最精彩的节点埋头调音，也在最焦虑的城市悠然自得。

以后会不会离开北京？他也想过几个养老的地方。比如回台湾、去泰国，或者加拿大的温哥华。“可是我再一想，明天的事情谁知道呢？说不定一会我从这个棚走出去就遇上交通事故呢。”于是，他决定先这样诚实地生活在这片喧嚣之地——这是他自己对于逝去的黄金时代的回应。

异乡人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恚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张淼：被虚构的崔健，被建构的香港音乐

崔健正是关注与关心那些年轻、多样的广东歌，才会有此一问，“为什么没有更现代更年轻一点的香港人来登到大陆的舞台上，去表现他们自己的声音？”

中国摇滚三十V.S. 台湾民歌四十：什么样的歌才是自己的歌？

大陆摇滚和台湾民歌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它们背后有一种共同的音乐精神。

陈升：说故事的自由人

“我终究得要告诉全世界说：我是自由人！高贵的自由人！没有派别的，为什么一天到晚这边的人说我是这边，那边的人说我是这边。”

张晓舟：在中国，嘻哈连献媚的机会都没了

不管嘻哈如何洗白与染红，当标语围城，习语蔽日，“革命街头艺术”驱逐嘻哈文化……

乐评人手记：我见证了中国摇滚乐杂志的退场

中国摇滚乐杂志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萌芽，发展，壮大到衰落，退场，就如同几个世代的青春与记忆：成长，又消逝。